

吳平 回達強 主編

廣陵書社

楚辭文獻集成



吳平 回達強 主編

楚辭文獻集成

壹

廣陵書社

中國·揚州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楚辭文獻集成 / 吳平, 回達強主編. — 揚州: 廣陵書社,
2008.8

ISBN 978-7-80694-129-4

I. 楚… II. ①吳…②回… III. 楚辭—文學研究—
文獻—彙編—中國 IV. 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31568 號

ISBN 978-7-80694-129-4



9 787806 941294 >

書 名 楚辭文獻集成

主 編 吳 平 回達強

責任編輯 胡 珍

出版發行 廣陵書社

揚州市文昌西路雙博館附二樓 郵編 225012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揚州文津閣古籍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張 695.5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80694-129-4/K·157

定 價 4800.00 圓(全 30 冊)

楚辭研究史論（代前言）

楚辭是以楚國民歌爲基礎，經屈原加工創造而成，得宋玉等人踵武發揚的新詩體。

楚辭與《詩經》一樣是中國詩歌最重要的源頭，它們分別代表了浪漫抒情與寫實言志的風格。與《詩經》相比，楚辭句法靈活，長短句轉換自由，這便造就了楚辭舒緩婉轉、參差交錯之美。楚辭句子較長，一般爲六言，也有七言，加之篇幅長容量大，這樣更有利于表現複雜的心理和廣闊豐富的生活，使作品益發多姿多彩。以屈原、宋玉作品爲例，二人作品總數不及《詩經》的十分之一，但作品風格的多樣性却是《詩經》所無法比擬的。這固然和二人的良才美質有關，與其坎坷曲折的人生經歷有關，更重要的還在于他們借助了『楚辭』這一表現形式。

屈原是楚辭最重要的作家。在某種程度上，屈原的作品就代表了楚辭。屈原（約前

三四〇——約前二七八），名平，楚國貴族。他憂思爲國，却不見容于守舊勢力，先後兩次被誣放逐，最後不願看到祖國滅亡，自投汨羅江而死。楚辭絕大部分的作品寫于屈原放逐途中，特殊的經歷和激越的情感鑄就了楚辭。《離騷》是楚辭中最燦爛的篇章，以致後人每每以『風騷』并舉，指代中國詩歌的源頭。《天問》是另一首瑰奇的詩。《天問》的價值還在于保存了大量神話傳說和古史資料。《九歌》是一組浪漫的祭祀歌舞詩，作品或幽怨，或淒惻，或纏綿，或悲壯，風采各異。《九章》文字清麗，感情深厚，字裏行間充滿了對國家命運的關切和民生苦難的同情。屈原的楚辭所呈現出的奇妙想象、生動比喻、細膩描摹、鮮明形象、深厚感情、瑰麗語言，不僅前無古人，而且其對來者的澤被依魯迅言之『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宋玉是楚辭最優秀的繼承者，後世不少評家以『屈宋』并提。雖然宋玉只有《九辯》一篇存世，但這并不影響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在《九辯》中，宋玉沒有直接傾瀉內心的激情，而是借助自然景物渲染自己的感慨，這樣便營造了一種情景交融的境界，開拓了詩的意境，增強了詩歌的表情達意。而宋玉作品中吐露的落拓悲愁和不平，揭露

的社會黑暗，也一直牽引着後世文人與之共鳴。

楚辭的搜集整理，始於西漢的劉向。他收錄了屈原全部存留的作品及宋玉、賈誼等人之作彙爲一集，名之《楚辭》。自此，《楚辭》便兼有了詩體和楚辭專集兩種含義。劉向所輯今已不存。東漢王逸據劉向本調整次序，以章句體例進行解釋，書末復綴己作一篇，這是至今尚傳最早的注本，後來的研究往往是以此注本爲基礎而展開的。

二

楚辭研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漢代。由於衆多俊彥碩儒參與其間，使得楚辭研究一開始就成果顯著堪爲高峰。此後，楚辭研究代有才人、高潮迭起。如宋代的楚辭研究、清代的楚辭研究、民國時期的楚辭研究，都可圈可點成就卓著。爲了方便楚辭研究史的敘述，我們試以朝代爲順序，分期對楚辭研究的狀況加以講述。

（一）漢唐時期

漢代開國皇帝劉邦對楚文化十分喜愛，從其創作的《大風歌》就可窺見楚辭的影

響。漢初幾位皇帝也喜愛楚辭。統治者的愛好促成了楚辭在整個漢朝的流傳。漢初淮南王劉安《離騷傳》是楚辭研究的開山之作，其後劉向《天問解》、揚雄《天問解》、班固《離騷經章句》、馬融《離騷注》，匯入楚辭研究的河流。可惜的是，這些著作今都已亡佚。此外，賈誼《吊屈原賦》、司馬遷《屈原賈生列傳》雖不是專門研究楚辭的著作，但因其有知人論世之效，也影響着楚辭的研究。

王逸《楚辭章句》是現存最早也最完整的楚辭研究之作，代表了漢代楚辭研究的最高成就，在整個楚辭研究史上也有突出地位。王逸的時代，漢代經學思想正主導着社會的各個領域，這使得他的研究帶有明顯的依托經義進行闡釋的傾向，具有解讀平實和注釋樸素踏實的風格。王逸據劉向所編《楚辭》十六卷，加上已作《九思》一篇，析爲十七卷。王逸的楚辭研究以訓詁爲主，每篇作品都有序文，說明作者生平、創作背景等，並解釋題意。然後從訓詁、校勘、釋義、評賞文字等方面，運用戰國以來的楚辭相關資料，對楚辭進行探究。王逸不僅熟諳楚地方言，也熟悉楚地傳聞，注釋又多采漢儒詁訓，並有自己的見解，因此注釋更貼近作品的本義。在研究範式上，訓詁方法成爲後來

研究楚辭者包括揚雄、洪興祖、戴震等大家在內的基本方法。當然，王逸《楚辭章句》并非訓詁這一單一研究模式的結晶。他開啓的探究義理的研究方式，也影響深遠，如洪興祖、朱熹、王夫之等都可列爲義理派的跟隨者。

兩漢的楚辭研究者們依『經』立論，以經文、經義爲準繩來品評楚辭，使楚辭研究從一開始就邁出了一大步，取得了像王逸《楚辭章句》這樣豐碩的成果。但這研究方式也使楚辭的解讀偏離于真正的藝術探討。

兩漢之後，楚辭的研究陷入平靜期。當然，其間也并非乏善可陳。魏晉六朝以來，隨着文學意識的覺醒，楚辭研究者們逐漸突破了經學的狹隘視野，開始以文學視角觀照楚辭，楚辭的文學價值得以凸顯。值得一提的是，蕭氏三子（蕭統、蕭綱、蕭繹）對楚辭的文學特徵和文學意義的評價多有創見，比起漢儒強調忠君諷諫之意，更能觸及楚辭的藝術價值。

（二）宋元時期

經過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時期的積累，楚辭又一次在宋代迎來研究的高峰時期。在

宋代，外族入侵的陰影刺激着人們的神經，這促使關心國家命運的有識之士需要張揚屈原式的忠君愛國來反對當時的投降派。這一時期，模擬楚辭體並采用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來寫作詞賦也非常時尚。這些都促成了宋代屈原和楚辭研究的興盛。

宋代的楚辭研究上承漢代，又深受理學思想和文學思潮的影響。他們或注釋，或編纂，或校勘，或考證，或研究音韻，或兼而有之，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經學研究模式的束縛，着重于義理闡發、文學特質的歸納總結，把楚辭研究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涌現出晁補之《重編楚辭》、《變離騷》、《續離騷》，黃伯思《校定楚辭》、《翼騷》，楊萬里《天問天對解》，錢杲之《離騷集傳》，洪興祖《楚辭補注》，林至《楚辭補音》，朱熹《楚辭集注》，黃銖《楚辭協韻》，吳仁杰《離騷草木疏》，謝翱《楚辭芳草譜》，高似孫《騷略》等重要研究成果。其中尤以洪興祖《楚辭補注》與朱熹《楚辭集注》成就最爲卓著，影響最爲深遠。

洪興祖《楚辭補注》中注釋詳實而客觀，思想評價激昂而尖銳，這是宋代高漲的文化氣氛和危難時局所激發的雙重影響。《楚辭補注》以王逸《楚辭章句》爲底本校訂原

文，又搜集衆多的《楚辭》版本，補缺糾誤，載錄異文，作《楚辭考異》。洪興祖注釋時廣徵成說，總結歷代楚辭研究的成果，還獨創『補注』體例，詳細補正前人注釋的不足。在闡揚義理方面，洪興祖突出強調了屈原的忠良品性和高潔的情操，賦予愛國新的內涵，成爲後世忠君愛國、憂國憂民之論的先導。洪興祖還探尋屈原之生命意識、生死觀、死亡意識，對神話也有較大的興趣，對某些藝術手法有一定認識，這些方面的研究雖然并未深入，但無疑啓迪着後代研究者以新的視角觀照楚辭。

朱熹《楚辭集注》中注釋和義理闡發既爲理學價值評判所左右，又不脫離文學的規範，顯示了朱熹作爲理學開創者的思想方式和文學素養。《楚辭集注》八卷，朱熹重新厘定了屈原作品的篇目。朱熹《楚辭集注》之注簡潔明了、文義貫通，分節注釋以顯示層次。朱熹將側重點放在義理闡發上。他從理學要義出發，突出發掘屈原的忠君品質，淡化屈原的怨憤之情和抗爭之心，大大拔高了屈原忠君愛國的形象。朱熹也是徹底地以文學眼光來看待、詮釋楚辭的第一人。他首先發現了《離騷》『男女君臣之喻』的意象結構與象徵體系。朱熹對楚辭中比興等藝術手法有獨到的見解和深刻的分析，這

顯示出他的詩人氣質和文學素養。雖然，朱熹對楚辭中神話的指斥似顯迂腐，但終是白璧微瑕。《楚辭集注》承前啓後，廣爲流傳，影響巨大，成爲後人治學的案頭之作。

承接宋代政權的蒙元統治者，並沒有接續宋代文化的繁榮景象。整個元代學術並不發達，楚辭研究著作更是稀見。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著錄了劉莊孫《楚辭補旨音釋》，可惜我們今天已經無法看到此書。我們只能從祝堯《古賦辨體·楚辭》中可見元人楚辭研究的努力。

(三) 明清時期

經過明初的皇權膨脹、學風沉寂的短暫局面之後，隨着正德朝的到來，文學復古思潮、陽明心學、考據學的先後興起，學術思潮日趨活躍，楚辭研究也進入了欣欣向榮的時期。據統計，明代後期一百四十年間，有近八十種楚辭研究著作問世。而明末清初三百餘年間，社會變亂、內憂外患與社會的轉型之際，楚辭研究更是空前的繁榮。

在明清時代，有與屈原時代風貌相似、個人遭際相近的研究者，他們堅守着屈原式的節操，以畢生心血研究楚辭，他們以苦痛的心靈去體味屈原心理；有經歷過朝代

更迭、目睹生民受難的研究者，他們索性高蹈，不仕新主，潛心研究楚辭是他們生命的寄托；有爲了國家百姓入仕清廷的研究者，他們并非蠅營狗苟之輩，他們欽慕屈原、珍重名節，因而見解亦常有獨到之處，給人以很大啓發。這一時期，產生了汪瑗《楚辭集解》、黃文煥《楚辭聽直》、陸時雍《楚辭疏》、周拱臣《離騷草木史》、王夫之《楚辭通釋》、李光地《離騷經九歌解義》、方苞《離騷正義》、林雲銘《楚辭燈》、王邦采《離騷彙訂》、屈復《楚辭新注》、胡文英《屈騷指掌》、蔣驥《山帶閣註楚辭》、戴震《屈原賦注》等重要的楚辭研究著作。研究者中尤其以汪瑗、王夫之、蔣驥、戴震成就最爲巨大。

汪瑗《楚辭集解》只收錄屈原作品。汪瑗論文崇尚師古，習于考據，這也影響了其楚辭的研究。在《楚辭集解》中，汪瑗每數句做一解釋，先擺出自己的見解，然後旁徵博引羅列諸家之說，縱論前人的得失。汪瑗在很多問題上都有自己的創見，雖然一些提法未必可靠，但這樣別出心裁的思考無疑爲研究楚辭提供了新的思路。《楚辭集解》中徵引了大量宋元以來的諸多舊說，徵引之書不少已經亡佚，而這些資料也未載于他書。《楚辭集解》對前人楚辭研究見解的保存，對於研究宋代以來的楚辭研究史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雖然《楚辭集解》曾受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嚴厲批評，言其『從臆測之見，務爲新說，以排詆諸家』、『疑所不當疑，信所不當信』，致使乾隆以後一度沉寂，但這并不能削減其在楚辭研究史上的價值。

王夫之身處明清易代之際，曾組織起義抗清，兵敗後避隱船山。王夫之心念故國而撰著《楚辭通釋》，他說自己與屈原『時地相疑，孤心尚相仿佛』，這種相似性使他對楚辭的理解在關鍵處更能比前代學者深入一層。《楚辭通釋》對楚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一、考釋屈原生平，二、闡發微言大義，三、訂正舊說訛誤，四、分析詞章藝術。王夫之自身的遭遇使他對楚辭有獨到的體會和見解，但他在闡發楚辭義理與寄托個人哀憤二者間取得了較好的平衡。在國、君、臣、民的關係方面，王夫之對屈原的理解也較前代學者前進了一大步。他認爲：屈原的愛國與忠君、忠君與怨君、愛國與憂民，都是統一的，統一的基礎是國。在訓詁考證方面，《楚辭通釋》屢創新說，闡義頗有突破，但也時有牽強比附處。在詞章分析方面，王夫之自言是『就文即事，順理詮定』。如他指出《九歌》主祭祀、《天問》主諷刺，都是推求本旨之後的結論。

蔣驥一生酷愛讀書、勤於學術，對《楚辭》用力尤深。他采摭書目四百餘種，以二十年時間著成《山帶閣註楚辭》。蔣驥繪有楚辭地理總圖，抽思、思美人路圖，哀郢路圖，涉江路圖和漁父懷沙路圖等五幅。這些地圖只是蔣氏研究楚辭地理的一部分，是將散見于各章注釋中的結論集中于此以作形象的顯現。他對先秦古地理有深入、系統的研究，考證了屈原生平及作品創作時的時間地點，即使以今天眼光苛求，也不失其參考價值。蔣驥對篇章結構的分析，根據史事、作品時地來探求屈原的處境和心情內在蘊的闡發，亦精闢中肯，令人擊節。在清代楚辭學著作中，《山帶閣註楚辭》富于開創性，以翔實取勝，是《楚辭》研究者的重要參考書目。

戴震不僅是治學嚴謹的樸學大師，而且具有先進的民主思想，這些都成就了《屈原賦注》。《屈原賦注》只收屈原作品，全書以大義貫文旨，以訓詁明大義，宗旨博辭約。但是，正因戴氏偏重考據，不尚空談，故于作品思想內容論述未足。戴氏書後附《通釋》，逐一考論考釋賦中名物百餘條。又汪梧鳳爲作《音義》三卷，亦附後，《音義》音讀詳明，校勘精審，多有可取之處。

(四)清末至民國時期

民國以來，尤其『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後，傳統的學術研究也受到歐風美雨的熏染，研究範式逐漸轉變。在這種背景下，《楚辭》研究的主流逐漸向全方位、綜合性的方向發展。這些研究者學貫中西，既有小學文獻功底，擅長考據之學，又學習過西方文化思想，熟悉西方文化學、人類學、民俗學、神話學乃至哲學等新的研究方法，從而超越了王逸開創的訓詁和義理的研究模式以及傳統的詩論與考據治學模式，開創了楚辭研究新視角，從而極大地推動了楚辭研究的發展。楚辭研究傾力較多、影響較大的有梁啟超、聞一多、郭沫若、游國恩、姜亮夫等人。

梁啟超《屈原研究》對屈原及楚辭作全新的論述，對後世影響極大，開近現代《楚辭》研究新風。梁啟超認為：屈原是千載文人之首，欲求表現個性的作品，首先要研究屈原。他運用西方哲學、心理學的知識來分析屈原，指出屈原對立的理想和感情在內心常常形成激烈的衝突，並最終導致他的自殺，令人耳目一新。他從屈原所處的社會環境與獨特的遭際出發，論述了屈原的獨特個性與文化品格，對楚辭產生的歷史背

景、文化淵源及其歷史地位作了獨到的分析。梁啟超還從神話學的角度對楚辭進行了探討，並認為《天問》是可與世界文學相媲美的神話文學。梁啟超是第一位從純文學和文學史的途徑、結合西方思想理論研究楚辭的學者，其學風給後來者以極大的影響。

聞一多楚辭研究的代表作是《楚辭校補》。他吸收借鑒了劉師培《楚辭攷異》的成果，並大量增補異文，務求其全。他善于體會文心，在紛繁錯綜中發明義蘊。聞一多還善用《楚辭》書例以校正訛字。他的最大特點就是「把古書放在古人的生活範圍裏去研究，站在民俗學的立場，用歷史神話去解釋古籍」（見陳凝《聞一多傳》第三頁），這是他超越前人的第一大貢獻。他深受蘇雪林的啓發和影響，運用宗教學、民俗學和神話學理論，從大的文化背景出發對楚辭進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提出很多新穎而富于創造性的見解，極大地拓寬了楚辭研究領域和思維空間。

游國恩楚辭研究著作甚富，堪稱大家。其《楚辭概論》為初學楚辭者入門之作。《楚辭注疏長編》是彙集上自漢代王逸下至晚清舊注之巨著，為今天的人們研究楚辭提供了大量的資料。《楚辭論文集》是游國恩楚辭研究的代表作，結集了他「疑古」與「考證」

的精華。《楚辭論文集》最大的特點，是把楚辭當作一個有機體，不但研究它的本身，還研究它的來源和去路，這種歷史眼光大大超越了前人。

姜亮夫《屈原賦校注》也堪爲代表。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就提出了『個別分析，綜合理解』的方法論，要求在現代科學文化的基礎上以史和語言爲主，運用十幾個學科的知識和角度，對楚辭進行全方位的考察，以便從總體上把握它。這些學科包括民俗學、社會學、史學、哲學、宗教學、語言學、文字學、音韻學、地理學、考古學等。《屈原賦校注》就是這樣的作品，此書確實達到了借史學、民俗學、宗教學等共說一事、共解一語的境界。

楚辭研究歷經漢代的初創、宋代的發展、明清的繁榮、民國的繼續前進，雖有沉寂之時，但綿延不絕不曾中斷，這是學術研究史上少有的現象。楚辭研究之所以能歷久不衰，并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主要得益于以下幾點：